

国外非正规就业研究的理论视角

黄家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国外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 有过五种不同的理论视角: 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这些理论争论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三个思想学派: 即“二元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守法主义”学派。本文结合我国进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现象, 分别对这三个学派的理论模型的解释力进行了粗略思考。

关键词: 非正规部门; 非正规就业; 理论视角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自从国际劳工组织 1972 年发表肯尼亚就业报告提出“非正规部门”概念以来, 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研究,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解释。根据威尔森 (Wilson, 1998)^[1]的一篇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 主要有过五种不同的理论视角: 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本文将借用该文章的框架介绍这几种理论并加以简要评述。

一、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

这一理论视角关注的焦点是城市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现象。从经济二元性分析出发, 持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 借以区分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存在着的两种彼此独立的经济结构, 如格尔茨 (Geertz, 1963)^[2]的“街市”部门和“公司集中”部门、托达罗 (1988)^[3]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等。按照这一理论, 在现代企业向传统部门渗透的过程中, 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度被边缘化和贫困化, 他们只好进入非正规部门以求生路。因此, 非正规部门是快速城市工业化过程中非熟练劳动力迁移的一种暂时的副产品 (Despres,

1988)^[4]。现代化理论预示,非正规部门经济和活动只是失业和贫困者的一种过渡,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迁入城市的移民必然从非正规部门转入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将逐渐消失。

二、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依附理论把关注的焦点从社会边缘化转向了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联系。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就业计划(PREALC)”的一些专家的观点(参见Wilson,1998),由于受制于外国垄断资本,依附性国家通常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它有两个特点:一方面需要进口重型机器,另一方面是资本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结果,精密或尖端机器取代大量劳动力,产生大批剩余劳动力,他们无缘进入正规部门,被迫自谋职业以寻求生路。这些自主就业与正规部门生产模式有很大区别,组成所谓非正规部门。其特点是:资本或劳动力比率低、通常是不支薪的家庭劳动、启动资金少、易进入、低劳动生产率、低技术等,并且所得收入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生计。

在PREALC的一些专家看来,由于非正规就业者被排斥在垄断部门之外,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结不存在剥削关系。而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被看作类似于“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非正规部门是正规部门的附属并在后者残留的夹缝中生存,它本身对资本主义体系既不发挥作用也不产生机能障碍,但非正规部门中的不同的职业与正规部门的联系与从属方式不尽相同。有些非正规职业具有相对独立性,如卖水果和蔬菜,既不需要外来输入也不依赖外来市场,而是直接从小农手中采购;其他的一些职业,则依赖于现代经济部门的输入、生产或销售,其中包括独立经营或来自正规公司转包合同的小规模制造业,以及从批发商购买商品的小贸易。

至于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前景,PREALC的专家们同样根据不同的行业种类,再次强调了其异质性。小规模制造业将最终被资本化、现代化的工业所取代;个体服务业将存活下来;而街头小贩和其他一些商贸活动将持续一段时间,直至为大规模的商贸设置所取代。同时,非正规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将依存于其中的国家及影响它的现行法律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PREALC的专家所持续关注对象是作为创业者的非正规小企业家,而对非正规劳工则有所忽视。因此,在政策建议上,他们倾向于为非正规创业者提供一揽子信贷支持以及管理、财会、小企业发展等培训。

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学家把拉美经济发展的困境归咎于国家的严格控制。洋溢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研究非正规就业的巨著《另一条道路：第三世界看不见的革命》英文版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极大反响。联系德·索托（2007[1989]）^[5]的观点，非正规就业活动被视为穷人和失业者的出路，非正规劳动者则被看作是小规模创业者，他们宁可游离于法律体制之外从事生产和经营，是因为现存的法律和官僚主义令他们不能从市场经济中分享体面、标准的生活。一方面，现存的法律体制只把各种经济发展机遇、国家资源、财产和权利分配给了正规经营者，另一方面，对小规模经营却设置了重重障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各种贿赂和腐败现象、执法部门的专横和野蛮态度，令获准正规经营的代价高昂。民众的非正规创业活动正是对这种厚此薄彼的法律、漫不经心和华而不实的官僚主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操纵经济现状的回应。在人们看来，“选择”非正规化生产和经营，要比遵守法律制度强加的许多限制效果要好得多。这样一来，“非正规”就被视为外生于劳动市场，而主要是歧视性法律制度的产物。

在《另一条道路》中，德·索托对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不是极力去迎合源自外部的贫困解释和二元经济模型，其核心概念“非正规”关注的是不顾或有意违反不合理的制度规则以获取收入和节省成本的活动。在他看来，这些非正规经济活动是人们相互依存、满足基本需要的积极的生产和再生产形式，是普通民众有勇气的创造，与国民经济整体密不可分，对国家经济有积极作用和巨大贡献，并认为这是一条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德·索托发现，正规部门对非正规部门不存在着剥削，非正规劳动关系与利润至上的资本家公司也没有联系。从新自由主义观出发，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关注的是社会和法律面向，包括简化程序、解除管制、权力分散、民主立法等。最近，德·索托（2007[2000]）^[6]又主张通过产权公证的办法，将非正规企业家非正式持有的财产转化为有效资本。

四、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marxism and neomarxism）

马克思主义用阶级关系理论对劳动市场活动加以了考察。在这一视野中，资本家的动力在于制造一支失业的后备军，以此促使工资下降，增加劳动力剩余和企业主的利润。马克思主义的“产业后备军”概念有三种主要形式：流动后备军、停滞后备军、潜在的后备军；而非正规就业劳工，通常没有合法合同或是按日计酬，被视为流动或潜在产业后备军的一部分则再恰当不过（Marcelli et al,1999）^[7]。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非正规性内生于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图，它为资本家获得剩余劳动力以及降低所有工人的工资提供巨大动力。

然而,现代化和全球经济重构背景下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能预见的。对此,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思考,尤其以拉美国家的学者为盛。他们试图将城市非正规部门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同时对马克思提出的相关概念(如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加以借鉴或修正,并借此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某些假设和结论进行对话。不过,新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包含不同的立场,因而对非正规就业的解释和评价也存在分歧。根据 Chowdhury (2005)^[8] 的文献梳理,这一派内部对非正规就业的解释存在两种显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边缘化”理论认为,非正规部门是一个独特的“边缘极”,充当劳动力后备军角色,并生产出廉价、低质量的生活必需品,便于正规部门的资本积累;相反,“小商品生产”理论则认为,非正规部门通过直接的经济链接而从属于正规部门,使得正规部门能够从中榨取剩余价值。

关于非正规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前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等人(1993[1989])^[9]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文献,总结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非正式经济并非社会边缘的贫困者所展现出来的一套求生存的活动,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暗含弹性与剥削、自由意志论与贪婪、生产力与虐待、有侵略性的企业主与缺乏防卫能力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非正规经济可能影响的层面包括:(1)非正规化过程对于形成分散的经济组织模型有极大贡献,有可能形成一种分散化、以网络为基础的工业管理新模型。(2)非正规经济扩张虽然总体上倾向于降低劳动生产力,有减缓劳动过程完全自动化、理性化的趋势,但是,相对于大规模组织的官僚结构,非正规经济的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其生产力提高。这两种趋势可能相互抵消或组合成复杂的模式。(3)最显著的经济影响就是降低了现代部门中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4)在社会效果方面,则瓦解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影响,加速劳动过程的去集体化,从而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阶级结构。至于非正规经济的前景,他们相信非正规化过程将会持续下去,其结局最终将由社会斗争和政治协商的动态来决定。

在政策建议上,新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是进行深刻结构变革和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

五、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边缘、半边缘)被分派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

中获利也就不平等（沃勒斯坦，1998）^[10]。在这种相互影响的状态中，贫穷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受剥削的基础，而发达国家则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1970 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根植于世界经济重构。在生产领域，循着追逐廉价劳动力以及保证在经济景气时期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能轻易地解雇它们的逻辑，分散化生产、弹性劳动安排、转包合同乃至低成本的小规模企业呈现出强化之势，对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三世界，非正规化过程因生产者和国家为走出经济停滞困境而采取的出口导向策略得以强化；相应地，发达国家非正规化现象的增长，类似的劳动力再生产安排则是受全球化影响的工业为谋求生存而作的努力（Portes and Sassen, 1987）^[11]。全球化固然带来新的工作和市场，但并非都是“好”工作，大多数处于劣势的生产者、劳动者也并非能抓住新的市场机会。于是，就业结构产生了深刻变化，体现在核心区是妇女劳动力（尤其是非全时制工资就业领域的妇女）相对份额显著上升，而在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则产生了过半的半无产阶级家庭的生产和就业领域，即“底层经济”显著增加（霍普金斯等，2002：93-94）^[12]。

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就业模式非正规化的普遍发展，实质上反映和体现的是资本扩张和劳动控制模式的变化。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非核心区内国家城市化速度激增，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严重剩余，注入到全球劳动力的后备军中，使得政府庇护的公司资本可以通过直接雇佣零工、通过生产和销售的分包制，来扩展其操纵的领域；与此同时，对公司资本的庇护导致政府管理就业不力，进一步扩大了临时工资的广度。而在核心区，随着制造业以及资本向非核心地区转移，其工业生产活动已经主要由家庭来完成，那些具有临时性和市场调节性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深化了生产地点从制造业工厂向血汗工厂的转变；与此同时，服务业和管理部门得到迅速扩展。这些变化为非全日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妇女和移民劳动力后备大军的就业（霍普金斯等，2002：99-111）。

就其经济功能来说，首先，这一类就业虽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却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扩张到边缘地区之后才出现的。其次，这些工作职位也并不是完全可有可无的。处于“边际”地位的这一类就业是同现代生产体系密不可分的，扮演着“极廉价的必要劳动”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廉价劳动的介入，有可能使地方政府与外资公司获得更大的利益（参见蔡禾，2003）^[13]。

可见，非正规就业并非必然地是无效的或“错误的”，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不可缺

少的“正功能”。因此，一方面，政府的管制确有必要，另一方面，政府的默认甚至暗中鼓励也许同样是有利的（卡斯特、A·波特，1993[1989]）

六、以上理论视角的总结和简评

在非正规就业概念提出之初，哈特及国际劳工组织非洲就业使团赋予其积极意义——注意到它的效率、创造性和适应力。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国外学术界在关于非正规就业的成因、内在特性、与正规部门以及正式制度环境的联系等方面，已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存在且大体类似的非正规就业现象，不同的学者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在笔者看来，当中原因主要在于理论家们所采用的分析路径和分析框架不同。玛莎·陈等人（chen et al 2004）^[14]曾将关于非正规部门的争论划分为三个主导性的思想学派，即“二元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守法主义”学派。对照这三大思想学派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五种理论视角也不外乎其中，而且各自的学科方法、分析焦点、分析层次、分析范畴等方面均存有较大差别（见表1）。

表 1：理解非正规就业的三个思想学派

	“二元论”学派	“结构主义”学派	“守法主义”学派
理论类型	现代化理论	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	新自由主义
学科方法	发展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
分析焦点	城市贫困	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及资本的联系	法律体制的成本和意义
分析层次	人口迁移、工业化不平衡及其社会边缘化结果	有利于阶级政治的生产法律制度和经济重构	有利于精英集团的社会法律体制
分析范畴	人口流动、过度城市化、收入机会、生存需要、创造就业	阶级政治、资本运动、劳动控制、资本积累、部门联系、产业结构、经济重构	官僚主义、重商主义、合法化成本、参与经济的权利、创业

“二元论”学派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它的基本观点是：与正规部门截然不同，非正规部门只是维持生计的边缘性活动，它为穷人提供收入机会和避难所。按照这一派的观点，非正规部门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经历的一个过渡部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就业模式的正规化，非正规部门将消失。

然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城市农民工进入非正规就业并没有像二元论所解释的那样简单。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在诸多作用因素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成为许多进城农民工唯一的甚至长期的选择了。更有甚者，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活动已经日益与正规部门结合在一起。这些事实不符合“二元论”模型所假设的传统（非正规）与现代（正规）两部门对立和由此到彼的简单转型。因此，二元论模型固然是基础性的，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体系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它决不是解释我国进城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理想模型。

“结构主义”的视角见诸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中。这一框架抛弃了“二元主义”的观点，认为非正规性内生于劳动市场，是厂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寻求生产重构和降低成本的产物。结构主义模型与二元论模型的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将正规和非正规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型和形式都视为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依照这一学派，非正规就业与第三世界不发达没有必然联系，相反，其持续和增长与“现代”、甚至“后现代”或“后工业”经济部门紧密联系着。

“结构主义”学派把焦点放在整个世界体系上，这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非正规就业现象置于更加广泛的、全球化的、结构性的背景下，从而有可能使我们在理解和分析进城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问题上前进一大步。遵循结构主义分析范式，如果将其逻辑推演到我国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身上，得出的结论将是：部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主要与引进资本主义有关，受制于资本发展的天性。应该说，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拥有相似人力资本的经历背景的农民工在城市所面临的机会结构大体上都是相同的。那么，用结构主义观点又如何解释他们之中依然存在着的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分流的事实呢？

“守法主义”学派最著名的代表是赫尔南多·德·索托，它流行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其基本观点是：非正规部门实质是“有勇气的”创业者、小型企业家，平头百姓选择非正规化经营，是为了避免正式登记所要花费的高额费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一视野中，

非正规性被认为外生于劳动市场——政府部门、官僚主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和就业的控制和垄断，是非正规经济活动出现、兴起和繁荣的根源。

我们看到，“守法主义”学派的观点遵循的是制度分析范式。按照其逻辑，可以认为：我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行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但面对制度性的约束，农民工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会在制度范围内或某些制度边缘，采用某些非正式的运作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这不同于结构主义范式，将个人完全视作外部结构性因素的玩物。因此，无论是从直觉还是经验上，“守法主义”学派所透露出的制度分析逻辑，或许更适用于解释我国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行为。

参考文献

- [1] Wilson, T. D. Introduction[J].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998, 25 (2):3-17.
- [2] Geertz, C.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wo Indonesian Tow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 [3]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M].于同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79.
- [4] Despres, Leo A. Macrotheories, Microcontexts,and the Informal Sector:Case Studies of Self-employment in Three Brazilian CitiesI[R]. Working Paper No.110, Kellog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8.
- [5] 赫尔南多·德·索托.另一条道路:一位经济学家对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的明智忠告[M].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6]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成功,却在其他地方遭遇了滑铁卢[M].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7] Marcelli, E., Pastor,M., & Joassart,P.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informal economic activity:Evidence from Los Angeles county[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9,vol.33(3): 597-607.
- [8] Chowdhury, Hedayet Ullah.Informal Economy,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J].Philippin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2005,VOL.31,NO.2-C.

- [9] 卡斯特、A·波特.1989,《底层的世界: 非正式经济的起源、动力与影响》[C].载于夏铸九、王志弘编译, 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 台北: 明文书局出版, 1993 年.
- [1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M].罗荣渠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194.
- [11] Portes, A. and Sassen. Making it Underground: Comparative Material o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vol.93 (1) : 30-61.
- [12] 霍普金斯、沃勒斯坦等著, 罗英等译.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 1945—2025[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13] 蔡禾.城市社会学: 理论与视野 [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225-226.
- [14] Chen Martha,Joann Vanek and Marilyn Carr. Mainstreaming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 Poverty Reduction: A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M].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2004:17.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o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Huang Jia-b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re are fi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y of informal employment—these associated with modernization theory, dependence theory, neoliberalism, Marxism and neomarxism, and world-systems theory. These theoretical debates crystallized into three dominant schools of thought: the dualist, structuralist and legalist schools of thought. Linking up with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of Chinese peasant workers in the city, this paper gives a rough reflection on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hree theoretical model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informal sector; informal employ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收稿日期: 2010-01-20

作者简介: 黄家滨 (1966-), 男, 汉族, 江西南康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 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